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基本形势、当前特征和主要战略问题

时 殷 弘

〈中国人民大学〉

摘 要

在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主要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中美关系的所有主要领域内的矛盾和紧张都有显著发展。此后至今，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和紧张程度显著缓解，其缘由特别在于中国近几个月里格外温和、审慎和合作性的对美态势，它们反映了对美基本战略的一大方面。与有限波动的中美关系相反，2005年的中日政治关系状况是至少约30年来最恶劣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严重怀疑它行将更为恶化下去，或者长时间保持对立僵局。中日关系恶化有其越来越显著的权势动因、心理动能和政策行为缘由，就此必须争取控制紧张、缓解危机和谋求基本稳定，同时操作对日战略的另两个基本方面。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中日“结构性战略对立”构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主要外部瓶颈。

关键词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结构性战略矛盾、结构性战略对立、中国和平崛起

中美关系状况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差不多总是呈变动幅度有限的波动不已状态，以致在太平洋此岸的观察家们中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几乎成了多年来的一句口头禅。

2005年内，人们广泛感觉到中美关系有了又一番波动，那就是从2004年秋季“中美关系30年来的最好状况”（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语）变为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显露甚至发展的中美关系紧张，继之以其后几个月里紧张的显著缓解。

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领域——经济互相依赖、安全问题选择性合作、政治和外交歧异、战略性的竞争和局部对立，而在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其中每个领域内的中美矛盾或紧张程度都有显著发展，构成了这段不长不短的时期里中美关系相当鲜明的特征。此种状况的根本背景，既在于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国际贸易规模、外交影响以及国防能力持续地高速增长，也在于美国对中美之间由此总的来说加速了的力量对比、影响对比变动趋势怀抱

的不安，甚至一定程度的焦虑。

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外交影响扩展、国内政治控制、境外能源追求、与若干“反美国家”的关系和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领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责及其直接间接的阻滞行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与先前相比最富特征的，除了有变得远为频繁的对于中国贸易行为方式的指责和压力外，便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军事力量加速增长公开表达的关切在这段时间里急剧增加并且升级。近几年来，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注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五角大楼也不时就台海两岸军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发表“中国军事威胁”言论，但中国军力发展问题不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的头等议程，而且就此表述的立场总的来说颇有分寸。然而，今年年初往后，来自美国决策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几乎不绝于耳，这在7月中旬五角大楼抛出实际上显著提升“中国军事威胁”级别的2005年《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达到了高潮。与之平行，美国近来对其西太平洋海空军事存在的

继续强化（包括首次在日本常驻核动力航空母舰），连同10月底美日两国之达成调整驻日美军部署和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议，构成美国晚近在对付中国军力发展前景方面的首要战略性预防举措。

如此的事态发展使人不能不感觉到中美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而且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潜在风暴。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中国由趋于紧迫的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力量趋于衰减的美国会比1972年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的必要。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必将（甚或已经在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战略性的矛盾使中美关系逐步地愈益带有强国之间竞争性关系的首要战略色彩。

在中国方面，国家利益的必需、增进了的力量信心和对于美国压力的愤懑等因素导致了2005年头七、八个月内相当强硬和不无“张扬”的对美态势，这尤其表现在不顾美国强烈反对而坚决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坚持维持甚或发展与伊朗、朝鲜、缅甸、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乌兹别克等国的关系，发表中俄两国国家元首《21世纪世界秩序宣言》，其中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支配”，并且举行规模甚大和予以热烈报道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然而，中美两国从各自的总体利益和战略全局出发，都需要控制中美之间的战略性争执，缓解过度的局部紧张，维持甚或发展有选择的安全合作，争取两国关系的大致可控和相对稳定。五角大楼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发表后，美国政府的“中国军事威胁”言论与先前相比有明显收敛。此外，布什总统

确定11月访华，而中断了数年的中美高层军事交流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次来华得以恢复。不仅如此，布什行政当局近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重要演讲中提出的“负责任的股东”之说）显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有了显著增进的正式认识，并且大概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的一项重大窘境——缺乏真正内在连贯和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进行关于战略方向的较系统的重新审视，其可以预料的趋势是在继续强化对华军事防范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同时，多少增大其他一些方面的对华协调成分，尽管实际上美国的这一战略窘境是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无法根本摆脱的。

中国对美态度在最近三四个月的格外温和、审慎和合作色调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调整多年里顶住美国压力而坚持不变的人民币官方汇率，以期缓和愈益严重的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声浪，以利维持和增长布什政府的对华合作意愿。不久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在美国国会内外关于中国能源战略“威胁”的政治喧嚣中，撤回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Unocal)的商业竞标之举，而少有中国方面对此喧嚣的公开愤懑之声。中国还就异常困难的朝鲜核僵局坚持耐心非凡的努力，导致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其最后时刻戏剧性地取得重大进展，从而“拯救”了六方会谈本身，并且由此得到了华盛顿的衷心称赞。大致与此同时，胡锦涛主席在相当复杂和紧张的中美关系气氛中与布什总统在纽约会晤，试图尽力缓解和改善双边关系。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近来以一段时期来罕见的频繁程度和着重程度，反复地公开申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和平意图，其目的首先是尽可能争取使美国对中国崛起较少疑惧。

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积极发起和认真从事中美两国政府高层“战略对话”；随后，对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9月21日所作重大演讲中全面指责中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体制，并且质疑中国的基本国家意图，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采取了显著的

克制态度和“淡化式”反应，而且大致只报道了这篇演讲的积极方面。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尽管拉姆斯菲尔德在访华访问期间大致重申了他过去对中国的所有指责，包括“中国军事威胁”，但是中国政府和军方仍然在其整个访问期间予以最大程度的礼遇，甚至“客气有加”，大体避免与之交锋。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于10月底公开表示欢迎西方国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未来东亚多边体制中发挥作用，以此首先争取减小美国的一项疑虑：中国趋于谋求将其势力逐渐挤出东亚。

近来格外温和的中国对美态度和政策反映了中国对美战略的一大方面，那就是在坚持中国重要利益和发展中国力量、不对美国做单方面重大退让的同时，持之以恒地大致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感，高度注意争取控制中美关系中的对立和冲突成分，有节奏地处理对美态势和政策的松紧张弛，在需要时采取旨在增信释疑的言行和有限的妥协举措，维持和增加美国在阻滞中国崛起方面的困惑、犹豫、无奈和其他局限，包括塑造为此所需的政府内外基本共识的困难。总之，这是以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复杂的中美关系，实行多面的和内在平衡的对美方略，以便维护、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当在对美关系中有更多的大战略目标意识，自觉地思考和系统地促进一种现在已显露端倪的未来大前景，那就是美国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和可能逐步倾向于不得不予以认真地考虑、甚或最终采取某种根本的“解决办法”，即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接受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领先地位，连同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线）的对美军力均势甚至起码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与此同时，美国持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影响优势。换言之，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分秋色”，

那就是美国最终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

2005年的中日政治关系无疑是1972年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坏的。不仅如此，随着2005年9月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事态、特别是小泉又一次悍然参拜靖国神社、组成以对外政策“鹰派”人物为核心的新内阁和外交大臣等阁员公开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很少有人严重怀疑中日政治关系或者可能行将甚至进一步恶化下去，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严重对立的僵局。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以外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其东亚邻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见和不可见地急剧提升了它们对中日政治/战略紧张的关注程度，以致美国政府甚至已开始以小心翼翼地有限规劝日本为侧重点尝试“调解”中日对抗。

近年来，中日关系在其基本结构或基础上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仍在继续加剧。第一是中日间“权势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变更，亦即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相当迅速地崛起，那就是日本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即要成为具有“正常”军事权利的政治强国，而且似乎决意不顾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对此怀抱的不安和担忧，我行我素地要将此变为既成事实，而不做认真切实的争取邻国放心的足够努力。日本的这一特定意义上的崛起，其首要动因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深刻的抵触和担忧心理。或者说，在中国崛起这一根本背景下，日本要搞一种“先发制人式的”或“预防式的”崛起。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质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和施暴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连同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逐渐倒退引发的现今愤怒，而在日本一方则有淡化、掩饰和扭曲这番历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使之更加难以控制。

第二方面最重大的变化，是中日两国国内发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变化。在中国，包含众多层面、产生众多效应的“中国崛起”，连同某些国内社会、政治和思想动因，导致了大众民族主义的强劲增长，而它针对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日本。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变化：多数日本公众与他们在1945年往后的半个世纪相比，变得愈益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同时作为这种变化的特征之一的，就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广泛和深化的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感，伴之以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判问题上愈益多见、愈益严重的倒退趋向。在民族心理和意念方面，中日关系中特别基本和意义重大的是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是怎样的国家的根本意象。多数日本公众正在形成、甚或已经初步形成这么一种“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多数中国公众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日本意象”则比较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很可能敌对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很可能能够“克服”或压倒的日本。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即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无疑，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这些关于对方国家的根本意象趋于造就根本性的战略疑惧和敌意。

在中日之间，持续紧张当然有可能升级为冲突或经久的冷战对抗。由于多方面非常深刻和重大的动因，在可预见的时期里，中日之间多项重大政治和战略争端大概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得到解决或消弭。然而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若不予制止，必定给东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重大危险。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要和切实的任务一般而言不在于（至少首先不在于）解决重大争端，而在于缓解紧张和谋求基本稳定，控制天然不稳定和潜在危险的中日关系对抗动能。为此，中日两国政府急需确定对待重大争端和谋求基本稳定的一条最根本规则，即两国不得在彼此间有重大争端的任何问题上采取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

行动。还有四条基本规则需要逐步确立，那就是：区别中日关系的四个主要领域——历史问题争端、战略对立、外交关系和经济互相依赖，尽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重大紧张或危机过度地影响其他领域；区别政府言行与民间言行，将政府言行当作判断对方国家意图和政策的唯一标准，防止或阻止民间反华或反日行动过度地影响政府间工作关系；在严重紧张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双方都应当认识到适当和有限地表示先做让步、至少以此试探对方意图和开创缓解或解决的机会是有益的。为了产生和施行这些规则，一定要争取逐步创设比较全面、比较集中的中日战略对话及其机制。

从更高层次战略的观点看，倘若在中国为避免长期对抗和冲突危险而切实努力的同时，日本政府由事实反复表明无意认真依据上述根本规则争取缓解紧张，那么中国就大致只剩一项对日基本战略选择：在中国奔向强大的总潮流中，坚决和持之以恒地实行强硬的对日态势和政策，包括在国际政治中争取最大可能程度地孤立日本政府。这么一种战略（或者说一种与坚持争取控制中日对抗和冲突动能可以大致并行不悖的战略）有其代价和风险，但在日本政府决意经久“较量”的情况下，中国大概不仅要被采取之，而且多半能够据此“克服”日本，亦即迫使日本最终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中国作为伟大强国的崛起。事实上，经过中国政府接近一年来实行以坚持对日强硬为主要特征的对日政策，日本越来越感到以其当前态度和心理应对中国崛起的根本代价，越来越尖锐地意识到它的现行对外政策基本方向面临的可能绝境。可以说，坚决控制中日对抗动能与在基本的力量对比、影响对比和意志对比的意义上力求最终“克服”日本，应当是中国当前和中长期对日战略的两个始终并行的主要方面，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尽可能的协调是其中的首要战略操作课题。

无论实施什么样的对日战略，无论中日政治关系状况有多恶劣，必须尽可能坚持在政治和战略上有理有利有节的“区别论”，并且尽可能细致地将其作为对日政策和对外工作的实际主导原则之一。

这实际上应当是中国对日战略中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中国至今为止做得最有欠缺的方面。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必须努力,通过合情合理的、能够逐渐吸引多数人心的方式,尽我所能地争取参与阻止日本公众经久地确定一种新的“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参与阻止他们由此改变对一系列安全问题的基本观念。对于这方面而言,中国争取缓解紧张、控制天然不稳定和潜在危险的中日对抗动能的努力至关重要,并且可以产生相当成效。不仅如此,这也在长期和根本的意义上关系到中国最终“克服”日本,迫使和促使日本最终在心理和态度上接受中国作为伟大强国的崛起。

对于日本公众对华舆论及其在一系列相关的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中国并非一定能够争取到想争取的状况,但这不等于无需非常认真和细致地尝试争取。中国要很认真地尝试,并且要尽最大程度的努力。中国的这种努力与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的恶劣行为进行的斗争一样,是参与决定日本国家方向与其未来状况的一类重要因素,是对中国安全环境和根本利益负责的一类表现。不仅如此,这样的努力本身就是对日本右翼的斗争的一个重大方面,因为它关系到争取不让日本右翼获得“中国

威胁”证据来便利俘虏尽可能多的日本公众,并且关系到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舆论同情中国对日态度。为此,中国的不少有关媒体和学者应当改变长时间来一种比较偏颇的做法,即一味发表欠缺“区别论”意识的、近乎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日本的文章和谈话,而不多考虑、多提议如何从战略视野出发争取控制中日对抗动能,争取形成可经久的对日政策体系,也不向民众介绍不仅包括众多消极面、也包括某些积极面在内的日本的全面情况。

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和当前已经远为突出的中日“结构性战略对立”都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密切相关。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或然性或可能性,而不是命定主义(determinism)意义上的必然。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使之不能成为这种必然的因素几乎没有别的,就是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中美结构性战略对立。与过去相比,这两项因素(特别是后一项因素)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至今为止人们还远未形成如何对待这两项因素、以致确有很大把握地避免强国间全面冲突和长期冷战对抗的基本答案。说到底,如果始终找不到这种答案,那么中国和平崛起就将面临过不去的“瓶颈”。